

中国经济四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回顾

张卓元

内容提要:1978 年年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标志着开始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市场化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主线,历程波澜壮阔:在改革初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深化改革阶段,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了市场化改革,才使中国经济迅速起飞,目前正在从世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阔步迈进。

关键词:中国经济 市场化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回顾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8)03-0003-13

1978 年年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标志着开始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邓小平开创的这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经济社会在短短的近四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8 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的 190 美元飚升为 2016 年的 8 000 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关键在于实行改革开放,逐步推进以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建立开放型新经济体制。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就经济领域来说,主要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或者说,市场化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主线。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开始的,从而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重大问题。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收稿日期:2017-12-04

作者简介: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100732。

第三,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了市场化改革,才使中国经济迅速起飞,连续三十多年以年均近两位数速度增长,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大幅上升,目前正在从世界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阔步迈进!

一、改革开放初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

1978年12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全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采取一系列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举措,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产出和财富快速增长,市场开始繁荣,广大干部和群众都亲身体会到市场机制的神奇作用。首先,农村开始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副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1%,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份增长2%~3%的速度,大大增强了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1]。其次,逐步放开农副产品、小商品和工业消费品价格,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商品价格放开后,虽然价格有一定上涨,但供应迅速增加,解决了长期困扰老百姓的商品短缺问题,并带来市场的繁荣。再次,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使国有企业有一定的自主权,开始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企业也有了一定活力。此外,还有允许个体工商户发展,兴办经济特区和引进外资等。

经济学家也在改革实践的鼓舞下行动起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了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主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参加研讨会的有三百多人,中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会议收到论文上百篇,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和超前的理论观点,包括: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的作用和竞争机制的作用^[2]。有的学者提出,企业是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主张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1980年1月,蒋一苇进一步提出著名的企业本位论^[3]。有学者提出对现有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需要进行改革,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4]。现在看来,1979年的经济理论研讨会对中国改革实践起着一定的先导作用。

二、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程中出现尖锐的思想交锋

确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步骤。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1979年的全国第二次经济理论研讨会,经济学界就有不少人发表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持反对态度,并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参加起草工作的袁木等五位同志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针对开始在经济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主张提出批评。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共同占有、

联合劳动的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5]1982年8月,胡乔木批转了这封信件。

自那以后,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出现了不少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文章,而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文章则销声匿迹,致使一些人对市场化改革表示怀疑。但是,阻挡改革大潮的杂音是注定要被冲垮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市场机制带来的经济活力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经济理论。从1983年开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以其更强烈的现实背景和更充分的理论论证,重新登上中国的论坛,吸引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党的文件方式对经济学界这几年的争论作了总结。决定说,“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从此以后,大家对发展商品经济和尊重价值规律的认识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决定通过的第三天,即1984年10月22日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6]

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也有认识不足之处,写了一句被后来改革实践超越的观点,这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商品。”

三、条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确立后,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进一步推进,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走在前列,带动商品和服务市场日益繁荣和发展,要素市场也开始建立,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等。1987年,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央和地方八个单位制订中期(1988年起三年、五年和八年)改革规划纲要,各家方案较一致的看法是:中期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新旧体制的转换,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主导地位。这种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内容,即“经济运行的市场化,企业形态的公司化,宏观调控的间接化”^[7]。还要指出的是,有的课题组明确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8]。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

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

党的十三大以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开展,1988年还尝试价格改革闯关,大量放开价格,但因受到通货膨胀的干扰未成。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认为由市场配置资源比由计划配置资源更有效率。

有的经济学家对那几年的市场取向改革表示怀疑或否定,比如有人批判说,“他们把商品经济关系,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鼓吹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9]有人还把“怀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崇尚市场调节的作用”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第八个表现”^[10]。还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11]。也有人说,在经济上讲“市场化”就是“自由化”^[12]。

当然,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反驳“计划取向派”的文章中,颇有影响的皇甫平的几篇文章。文章的背景是,1991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在上海视察。他语重心长地对上海市的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6]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了邓小平讲话精神后,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与报社评论部负责人凌河、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施芝鸿三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写了四篇系列评论文章,在2月15日至4月22日期间相继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阐述邓小平讲话精神。其中,3月2日发表的第二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经济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明确提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说,“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文章认为,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第三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刊登在3月2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上,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的文章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1991年4月20日,《当代思潮》杂志发表文章《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的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说“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北京的大报和杂志也进行了类似的批评^[5]。

在改革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1992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更加直截了当地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的讲话反映了中国改革实践的呼声,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许多经济学家的拥护和热烈响应。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

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在这之前不久,1991年10月至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了十一次专家座谈会(每次半天),参加这十一次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张卓元、陈东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有关专家,总共不到20人。座谈会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二是对苏东剧变进行分析,三是对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目的是为次年党的十四大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纲领提法进行酝酿。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在座谈会上,一些专家建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比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高。这个意见获得到会专家的普遍赞同。因此,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样就为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13]。

现在看来,正是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和江泽民1991年底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意味着长达十几年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基本上打了一个句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起来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确立起来了。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具体化。《决定》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上几条,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也是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内容。

四、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使改革大步向前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并于二十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从计划主导型转为市场主导型。

1994年,经过多方谈判协调,实现了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落后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步达到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在分税制中,增值税是最大的税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成,中央得75%,地方得25%,消费税则全归中

央 增值税和消费税比上年增长的部分以 1:0.3 比例返还地方。这一改革一方面促进了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1993 年全国财政收入 4 348.95 亿元,而到 2007 年,全国财政收入跃增至 51 304.03 亿元,增长(名义增长)了 10.8 倍;另一方面是中央财政收入占的比重迅速提高,1993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22%,而到 2007 年,这一比重提高到 54.1%,此后一直稳定在 50% 以上^[14-15]。

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逐步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来。私营经济户数 1993 年、1994 年、1995 年增幅均达 50% 以上,1996—2002 年年均增幅也达 15% 以上^[14-15]。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利用外资。1992 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吸收和利用外资走上快车道。

到 2012 年底,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共计达 440 609 家,投资总额 32 610 亿美元,注册资本 18 814 亿美元,其中外方为 14 903 亿美元。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中,有 60% 左右投向制造业^[15]。

由于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不断发展,到 2012 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已超过 6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 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5]。

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逐步推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 年,党和政府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从 1998 年起,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二十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 2000 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 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 16 874 户,其中亏损的为 6 599 户,占 39.1%;到 2000 年,亏损户减为 1 800 户,减少近四分之三。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努力使国有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6-17]。

2012 年,有 54 家国有企业进入《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 500 强。国有经济牢牢地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2012 年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953 家,占 A 股上市公司总量的 38.5%,市值 13.71 万亿元,占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的 51.4%^[15]。经济运行机制也在加快转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起基础性作用。1992 年以后,价格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资源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到二十世纪末,中国商品和服务价格已基本上放开,由市场调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 70% 以上,市场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买方市场已取代连续近半个世纪困扰中国人民的卖方市场。有关机构 1995 年以来对 600 余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显示,从 1995 年开始供过于求的迹象已显现。在大部分商品供求平衡的基础上,供过于求商品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供不应求商品。到 1998 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零售市场上已经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而供过于求的商品的比例已占 25.8%^[18]。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积极推进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坚持市场化方向,提高市场化程度。首先是放开煤炭价格,实现由市场调节。深化成品油价格改革,到 2012 年成品油价格已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间接接轨,2013 年 3 月又将调价周期由原来的 22 个工作日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并取消调整幅度限制,但设置了成品油价格调控的上下限(上限为每桶 130 美元,下限为每桶 40 美元)。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建立天然气价格与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了非居民用天然气存量气与增量气价格并轨。放开直供用户天然气价格后,占消费总量 80% 的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已由市场主导形成。逐步提高一直严重偏

低的水价,调整水资源费、排污费和污水处理费。

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也逐步推进。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工资已由市场形成。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先放开贷款利率,后放开存款利率,包括上浮幅度。人民币汇率也逐步放开,经常账户汇率早在二十世纪末就已由市场形成,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在逐步推进。土地市场也在逐步提高市场化程度。

中国于 2001 年 11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许多产业会受到很大冲击。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入世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获得大发展,提高了开放型经济水平。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2—2012 年,中国出口总额年均增速达到 21.3%,在全球的位次由第六位升至第一位。2012 年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 11.2%;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38 67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4 710 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服务出口居全球第五位。从对外投资看,201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878 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15][9]}。

2003—2012 年,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改革有所放慢,但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并且取得一定成效。这包括 2005 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 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

五、党的十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深化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后,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重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决定》中经济体制改革部分有许多亮点,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大发展,对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有重要意义。

1. 《决定》的第一个大亮点,是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代替已沿用 21 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

《决定》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性”和“基础性”只有两字之差,但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决定性作用能够更加确切和鲜明地表达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指向有三点:

第一,解决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问题。直到 2012 年,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一些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追求本地区短期 GDP 增幅最大化,为此不惜拼资源拚环境,大量资源被低效利用,浪费严重,同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害,债台高筑,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老百姓对此怨言不少。一些中央部门则热衷于维持审批体制,追求部门利益,有些官员甚至搞权钱交易,违法谋取私利。与此同时,政府在向老百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监管食品药品安全及治理环境污染等方面又做得很不到位。所以,《决定》指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可以看出,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是这轮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的关键。此后,国务院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3月5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在提前完成本届政府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去年又取消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清理规范192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相对而言,地方政府改革力度需要加大一些。地方政府如何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如何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如何硬化财政约束和不再无序扩张债务,如何更好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有待交出更好的答卷。

第二,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问题。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有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正如《决定》指出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消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直到2012年,中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这同政府不当干预过多有关,也同市场发育不够成熟有关;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也不健全,有的地方政府搞市场封锁,对外地产品和流向外地原材料搞价格歧视;搞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妨碍竞争,谋求不正当利益;为鼓励本地区高耗能产品生产的发展,不顾国家禁令实行优惠电价,违规实行低价地招租引资,放纵排污和税收优惠等;假冒伪劣产品也时有出现,冲击市场,坑害消费者。《决定》公布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进程明显加快。深化价格改革取得新进展,截至2016年底,97%以上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形成,一些重要领域如电力、成品油、天然气、铁路运输等的价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金融监管逐步加强和完善,201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宽市场准入,对外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已由2013年的190项减少至2017年的95项,减少了一半。有关部门还提出,确保从2018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从两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分离,发展为三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第三,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设置等问题。直到2012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总是有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陈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础。《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是《决定》的一个亮点。一个时期以来,由于认识的不足,有的也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导致在政策和行动上对非公有制经济设置和实施了一些歧视性规定和举措,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玻璃门”、“弹簧门”等,限制竞争,在贷款方面的歧视致使许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很高。党和政府一直努力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这次《决定》明确指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通过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各地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规范对外投资等,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2. 《决定》的第二个重要亮点 是国资监管机构从以管企业为主到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决定》说,“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定位,科学界定国有资产出资人监管的边界,建立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

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家、省、市(地级)成立国资委,结束了多年来“九龙治水”的弊端,但是始终解决不好国资委既当老板又当婆婆的问题,从而也很难解决政企分开的问题。这次从“以管企业为主”到“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改革,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的举措。这意味着:

第一,国资委不再是国有企业事事都要向其请示的顶头上司。在“以管企业为主”的体制下,国有企业即使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成立了董事会,但是这个董事会却无法履行《公司法》赋予它的权力,不能独立地对公司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因为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国资委请示后才能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公司连自主经营决策权都没有,更谈不上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国有企业这样的微观层面也落实不了。现在要转变为“以管资本为主”,除个别例外,国资委就真的是只当老板,给出资公司派股东代表和董事,让公司董事会真正履行《公司法》规定的权责。2017年7月,国务院出台《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实施方案》,要求2017年年底以前,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登记、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不含中央金融、文化企业)要全部改制为按照《公司法》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此次改革涉及将要转制的69户央企集团公司总部(央企总共101户)资产近8万亿元,以及3200余户央企子企业资产5.66万亿元^[20]。此项拖了二十多年的改革终于可以在2017年年底落地了,这既是深化国企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落实“以管资本为主”的重要条件。

第二,组建或改组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国资委要做到“以管资本为主”,就要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依法对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和其他极少数监管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履行出资人职责。因此,以后一般国有企业就是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打交道,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被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即老板。从2014年起,国务院国资委即进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到2017年,已有中粮集团、国投公司、神华集团、中国五矿、宝武集团等10家公司试点。试点主要从三方面进行探索,首先是发展国有资本专业化运营,同时探索有效的投资运营模式;其次是探索国资委与企业的关系,完善国有资产监管模式;最后是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内部改革,探索市场化的企业经营机制^[21]。

第三,国资委的主要职责,是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提高国有资本的流动性。按照《决定》指出的,今后国有资本投资重点主要是以下五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直到现在,国有资本还未做到集中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仍有大量国有资本存在于一般竞争性产业,包括大部分央企热衷于投资房地产业(不含保障房)。今后需要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

第四,国资委将专注于提高国有资本运作效率,实现保值增值。在“以管企业为主”条件下,国资委要管一

百多家中央企业,管理的战线太长,与管理学原理一般的直接管理三十户左右比较有效率的要求相悖,更何况央企下面还有五六个层级最多的达十个层级的子公司、孙子公司、曾孙公司等等,国资委更是鞭长莫及。这就影响国资委专注于提高整个国有资本的效率,也不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因侵吞贪污、关联交易、利益输送、违规决策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时有发生。如2015年中央巡视组发现,在中国石化、中国海运、中船集团、神华集团、东风公司等央企,都不同程度存在搞利益输送和交换、关联交易谋利等突出问题^[22]。造成这一端的原因很多,但与“以管企业为主”的体制机制有一定关系。

3. 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决定》的又一亮点

《决定》说,“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段话对改革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第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腾飞,国有资产和资本、民间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均有巨大增长。到2016年年底,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已达144.1万亿元,私营资本30万亿元以上,2010年以来,每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均在1000亿美元以上,社会资本投资已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0%以上。因此,从社会层面看,中国经济已经是混合经济了。这次《决定》指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指微观层面的,即要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另一方面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允许员工持股,具有一种新的激励机制。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决定》更进一步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实现形式。长时期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公司制可以是国有独资公司,股份制也可以是几个国企入股的股份公司,而发达国家的股份公司一般都是私人资本持股的,只有混合所有制经济才是真正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经济实体,而投资主体多元化正是国企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以克服原来国有制弊端和提高效率的重要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的发展形态和升级版。

第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重要的指向。其一是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资本的积极性,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这种优势不要只限于独自发挥,而要通过交叉持股互相融合作为整体发挥出来。比如,为了加快具有正外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考虑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并因此推动其提高效率,缩短回收期限,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其二是为国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打开通道。《决定》提出,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自然垄断行业有大量竞争性业务需要放开,怎样放开?最佳选择就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吸收非国有资本参与。这样,可以把多年垄断经营的竞争性业务放开竞争,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与此同时,国有自然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出售部分竞争性业务股份、筹集资金、加大科技投入等,改善自然垄断环节业务。在《决定》出来以前,处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企,基本上都已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革比较滞后的是垄断行业,因此,这次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针对性最强的,可以认为就是为了更好地推动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

第三,《决定》出来后,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深化国企

改革的重点。2014 年 7 月 15 日国务院国资委在中央企业启动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并确定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为试点单位。到 2017 年 11 月,由国家发改委指导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分三批共达 50 家。一些省市也纷纷出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和措施。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中央企业新增近千户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子企业,截至 2015 年年底,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改制面超过 90%,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 67.7%,累计引入社会投资近 2 万亿元^[23]。但是,总的来说,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仍然不够快,试点企业的经验至今未见披露,有的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审批协调程序相当复杂。中国联通是近年列为国资委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企业,直到 2017 年 8 月,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协调,涉及中央部委竟达十个。混合所有制改革涉及比较大的问题是股权比例安排和国有资产估价,这也有待逐步取得共识和周到协调与公开透明操作。

4. 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出来

《决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消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并就如何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说了五条,现择要阐述如下:

第一,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决定》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此前中国一直实行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2017 年 6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列入负面清单中的限制、禁止类内容共计 63 条,比 2015 年版减少了 30 条。该文件明确提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这标志着中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开启了新的时代。

《决定》说,“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此后三年中国营商环境大为改善。营商环境的优化,充分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力。2014 年起,全国平均每天新设企业都在万户以上,2017 年前七个月则达 1.6 万户,而商事制度改革前的 2013 年每天新设企业为 6 000 多户。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便利度近三年来在全球跃升了 18 位,平均每年向前跨升 6 位^[24]。

第二,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决定》指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决定》出台后,价格改革迈出较大步伐,取得了明显进展。首先,政府定价项目列入清单。2015 年 10 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录》,定价范围大幅缩减,种类由 13 种(类)减少到 7 种(类),减少 46%。具体定价项目由 100 项左右减少到 20 项,减少 80%。与此同时,地方具体定价目录平均减少约 50%。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方面,2014 年,政府实施了放开烟叶和桑蚕茧收购价格的改革,标志着农产品价格全部由市场形成。2016 年,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新疆棉花、东北大豆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总体顺利,国内外市场价差缩小。在深化能源价格改革方面,输配电价改革 2014 年底首先在深圳电网和内蒙古电网破冰,到 2017 年 6 月底,实现了省级电网全覆盖。2015 年放开了跨省电能交易价格,由送受双方协定。同年,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2016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根据煤炭价格下降幅度,下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 3 分钱,并同幅度下调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每年可减少企业用电支出约 225 亿元。到 2015 年,全国 40% 以上天然气

价格已经放开。稳步推行居民用水用气用电阶梯价格制度。截至2015年年底,31个省(区市)中,除青海和西藏以外的29个省(区市)已经建立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已通气的30个省(区市)中,除重庆和新疆外的28个省(区市)均已建立阶梯气价制度。阶梯电价制度自2012年试行以来运行平稳,除新疆和西藏外,其他省(区市)已全面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制度^[25]。

第三,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决定》提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此后,又进一步明确,要从两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分离,发展为三权分离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第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决定》说,“扩大金融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此后,多家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已相继营业。随着人民币储蓄存款利率上限被取消,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实现。国务院已于2015年4月公布《存款保险条例》,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了50万元的最高偿付限额,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展技术市场。《决定》提出,“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完善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在党和政府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下,技术市场迅速发展。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为此,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方面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以上这些改革和发展思路和举措,都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继承和发展,将指引中国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向现代化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60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 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3]蒋一苇. 企业本位论[J]. 中国社会科学, 1980(1): 21 - 36.
-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料室.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形成问题[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5]彭森, 陈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6]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7]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司. 中国改革大思路[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88.
- [8]吴敬琏. 经济体制中期改革规划纲要[M]//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司. 中国改革大思路.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88.
- [9]陈益寿.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思想[N]. 理论信息报, 1989 - 08 - 14.
- [10]王一夫. 经济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十二个表现[N]. 理论信息报, 1989 - 08 - 07.
- [11]高荻. 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N]. 人民日报, 1990 - 12 - 17.
- [12]评论员. 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N]. 当代思潮, 1991(2): 5 - 8.
- [13]陈君, 洪南. 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 年回顾[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 [14]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15]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6]编写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 党建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2013.
- [17]迟福林. 市场决定[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 [18]刘国光. 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9]高虎城. 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M]//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20]杨烨. 8 万亿央企资产改制年底完成[N]. 经济参考报, 2017 - 07 - 27.
- [21]杨烨.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提速[N]. 经济参考报, 2017 - 08 - 09.
- [22]陈治治. 关联交易是痼疾 顶风违纪仍频发[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5 - 02 - 07.
- [23]沈奕昕. 国企混改需要凝聚共识稳步推进[N]. 经济参考报, 2017 - 01 - 25.
- [24]林丽鹂, 王珂. 我国加速打造营商环境新优势[N]. 人民日报, 2017 - 08 - 17.
- [25]许光建, 丁悦玮. 深入推进价格改革 着力提升“放管服”水平[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5): 5 - 10.

Review of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China's Economy

ZHANG Zhuoyu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t the end of 1978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embarking on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as the main stream of economy reform, is a magnificent ev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reform, the market mechanism was immitted into the economic operation and the law of value gained more importance. In the stage of deepening reform, it is the core issue of how to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s, while establishing the target of refor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cientifically echoed the issue. It is because of the insistence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China's economy has lifted off, and now China is taking big strides from large to strong in the world.

Keyword: China's economy; market-oriented reform;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eview

责任编辑: 姚望春